

甘肃历代诗文词曲鉴赏辞典



主编：匡扶
副主编：

龚喜平
张兵
孙京荣

敦煌文艺出版社

匡扶 主编

甘肃历代诗文词曲
鉴赏辞典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6号

责任编辑：王亦军
邓争旗
封面设计：马一青

甘肃历代诗文词曲鉴赏辞典

匡扶主编

莫喜平 张兵 孙京荣 副主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张掖河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700,000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87—272—4/1·238 定价：23.80元

前 言

甘肃，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域辽阔，山川壮美，物产富饶，文化灿烂。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化。秦昭襄王置陇西、北地郡。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遣霍去病开河西，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开拓了中西贸易的“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的“五凉”政权。隋唐时代，是甘肃政治、经济、文化的极盛时期，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宋代，党项羌建立了西夏政权。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取甘州、肃州首字，设甘肃行中书省。明清以来，甘肃又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陇右文化的历史长河里，甘肃本土作家的创作，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外省旅陇作家的歌唱，此起彼伏，名篇迭出。它们共同构成了历代甘肃文学的壮美旋律，生动地吟唱着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的辉煌、苦难、抗争和希望。

陇原大地，作为炎黄文化的故土和周、秦的发祥地，毫无疑问，先民们一定创作了不少优美的远古神话、歌谣和传说，《诗经·秦风》中的部分篇章，便是明证。唯其有着灿烂的远古文明、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富饶的文学沃野，方能早在东汉时期即已出现王符、秦嘉、徐淑、赵壹等一系列闪光的名字。他们分别以其针砭时弊的政论、情深意长的诗歌、愤世嫉俗的辞赋，标志着甘肃文学史的光辉开端，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面对东汉年间的黑暗现实，王符终身不仕，隐居著书，写下了《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这部政论散文的名著，不仅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而且奔涌着文学的激情，抨击时政，鞭挞腐朽，集中体现了作者除弊兴邦的政治主张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其文结构严密，笔力道劲，语言质实，情感醇厚，被清人刘熙载誉为“东京之矫矫者”

(《艺概》),成为东汉政论散文的代表作。秦嘉、徐淑夫妇则以情辞恳切、缠绵哀婉的情诗和家书,深受后世推崇。梁代钟嵘《诗品》谓其“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明人胡应麟则称“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诗薮》)。这对夫妻诗人以自然清新之笔,写人间至真至纯之情,“词气和易,感人自深”(沈德潜《古诗源》)。这种感伤的离情别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社会的乱离现实,更表现了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其中秦嘉的《留郡赠妇诗》三首五言诗,还是标志我国文人五言诗趋于成熟的代表性作品,语句整齐排偶,节奏婉转自然,体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汉代甘肃作家的这种探索与创新精神,也同样体现在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家赵壹身上。他为人狂放不羁,忧时愤世,激情似火,尤以《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著称于世。前者以“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长触,摇足恐堕”的“穷鸟”形象寓写士人心声,后者则直抒忧愤,指斥黑暗,表现了作者“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的人格魅力,淋漓酣畅,大胆率真,标志着汉代赋风的转变,在辞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也是各种文学思潮、文学体式演进嬗变的重要时期。傅玄、阴铿,就是两位在诗歌形式变革探索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甘肃籍诗人;而根植于河西大地的“五凉文学”,则以其鲜明的多民族色彩和地域特点,成为该时期引人注目的独特文化现象。

傅玄是魏晋乐府诗的代表作家,尤多反映妇女生活之作。诗中或赞美她们的真挚爱情,或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或歌颂她们的反抗精神,立意新颖,构思精巧,情味深长。《杂言》一诗,仅“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十二字,就将女子痴迷哀怨的神韵情态写活写绝,形神兼备,呼之欲出,又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祖籍武威的梁陈诗人阴铿,则以五言新体名重当世。其诗以写景见长,尤工于描绘江上景色。风格流丽清新,形象鲜明生动,许多诗作已暗合律诗格式,为唐代近体诗的成熟创造了条件。盛唐两大诗人,“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阴铿”(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杜甫自谓“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可见他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其写景名句如“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开善寺》),“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晚泊五洲》),“寒田获里静,野日烧中昏”(《和侯司空登楼望乡》)等,也广为传诵。

十六国割据时期,中原地区长期战乱,文化萧条,甘肃的河西地区却一度成为北方文化的中心,出现了五凉文化的繁荣,涌现出不少作家作品。其中,前凉张骏的《薤露行》、《东门行》,马岌的《题宋纤石壁诗》,西凉李暠的《述志赋》,北凉胡叟的《示程伯达诗》等,都是较好的篇章。另外,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傅咸,前秦的苻融、苻朗,北朝时期的辛德源等人,也都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着不同的成就。十六国作家作品的发掘,是近年间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收获,而五凉文学又是十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填补了西晋至北朝一百多年间北中国文学文人创作的空白,值得珍视。

汉代以来,随着甘肃地区的开发和丝绸之路的贯通,在本省作家作品不断涌现的同时,一些外省作家特别是南朝作家也开始关注这片神奇的土地,吟唱陇右山川风物、人文故实,成为历代咏陇之作的肇始。诚然,这些最初的咏陇篇章更多地还是以乐府旧题如《陇头水》之类出之,作者本人也未必像唐人那样亲临陇上,而诗中所写又多系泛咏,但它依然显示了陇右山川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和感召力。左延年的《从军行》、鲍照的《建除诗》、虞羲的《咏霍将军北伐》、徐陵的《陇头水》、王褒的《关山篇》等,皆系代表之作。尤其是北朝北魏作家温子升的《凉州乐歌》二首,描述重镇凉州“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的盛况,正是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而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著名作家庾信,则写有《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龕铭并序》,状写麦积山石窟精妙的建构艺术和浓郁的佛国色彩。这两篇诗文分别较早较好地表现了河西雄姿和陇南秀色。

唐代,甘肃文学的鼎盛时期。经过汉魏六朝以来的长期发展,终于出现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作家,不仅为推动甘肃文学的发

展，也为促进唐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诗词创作是甘肃唐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的甘肃籍作家就有赵彦昭、赵微明、李益、李约、权德舆、李程、牛僧孺、王仁裕、牛峤、牛希济等人，其中尤以中唐李益的边塞诗和晚唐五代牛峤、牛希济叔侄的花间词成就突出。李益早年曾客游燕赵河朔，“五在兵间”，从军塞上凡二十余年。又曾漫游湖湘。官至礼部尚书。他诗名早著，尤擅七绝，曾自编《从军诗》五十首，成为中唐边塞诗的代表作家。自言其诗“咸多军旅之思”，“或由军中酒酣，时或塞上兵寝，相与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于慷慨意气。”（《从军诗序》）他的“征人歌且行”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夜上受降城闻笛》诗，“天下亦唱为乐曲”（李肇《唐国史补》）。胡应麟《诗薮》谓“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又兼工各体，如五绝《江南曲》写闺怨，意味深长；五律《喜见外弟又言别》写聚散，情韵悠然；七律《同崔邠登鹳雀楼》写登临，境界壮阔。不愧为甘肃历代作家中创作实绩最杰出者。如果说李益的七言绝句能于“七绝圣手”王昌龄和“诗仙”李白之后别开生面、再造辉煌的话，那么，二牛则于词这一新体尚处始创发展阶段便以其有益的创作实践做出了自己可贵的努力，成为著名的花间派词人。牛峤存词三十二首，牛希济十四首。他们的作品虽然有着花间派词题材狭窄、风格柔媚、词藻华艳的共同特征，但亦有独到之处。如牛峤之作能够对善良无辜的女性寄予同情，并较早地表现了征夫思乡、闺妇念远的内容，较有社会意义。牛希济的有些词饶有南朝乐府民歌情味，清新生动，不乏创新精神。这在当时的词坛上都是难能可贵的。明人汤显祖称道牛峤“感物写怀，言不尽意，真托咏之名匠也”（《花间集》评语）。牛氏叔侄的词作还得到了清末况周颐、王国维的赞赏。

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对古文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便是甘肃唐代文学的又一突出成就，甘肃籍作家梁肃、权德舆、李观、李翱等人，就是这

一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重要实践者，梁肃、李翱尤为突出。梁肃曾师事独孤及，其文为李华所推奖。他又能奖引后进，贞元八年（792），协助陆贽主试，推举韩愈、欧阳詹等登第。其文崇尚古朴，为韩愈、李翱所师法，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作家。李翱则以突出的创作实绩名重一时，与其师韩愈并称“韩李”。欧阳修称“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苏氏文集序》）。苏洵谓“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上欧阳内翰书》）。宋代两大家的评价足以说明李翱古文的位置和影响。传世的《李文公集》存文一百零四篇，诸体兼长，自具风格。《题燕太子丹传后》、《杨烈妇传》、《高愍女碑》、《感知己赋》等名篇，都有一种气盛言宜、文情并茂的特色。在理论上他主张义、理、文三者兼重，“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并创造性地提出“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答朱载言书》）的独特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

正是在古文运动和魏晋小说传统的双重作用之下，唐代传奇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历史进程中，甘肃作家李朝威、李公佐、牛僧孺、李复言、皇甫枚、王仁裕等，皆一时名家，他们的代表作《柳毅传》、《南柯太守传》、《飞烟传》等，堪称唐人传奇中的精品。唐人小说创作中的甘肃作家群及其大量作品，与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的王嘉及其志怪小说《拾遗记》交相辉映，共同体现着甘肃古代小说创作的悠久传统和繁荣景象。

“志士每多登陇首，诗家端爱唱边声”，这是盛唐文化的一大景观。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不仅促成了唐代边塞诗派的崛起，也使唐代成为历代旅陇诗人众多、咏陇名篇迭出的一个黄金时期。“安史之乱”以前，河西陇右一带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加之壮丽的山川景象和奇异的民族风情，曾吸引无数诗人奔赴边塞，建功立业。或从军陇右，任职河西，如王维、高适；或途经甘肃，西出阳关，如王昌龄、岑参；或壮游苦旅，辗转陇上，如杜甫、李商隐。

他们亲身经历和感受了陇右大地奇妙神异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如王维边塞诗中“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烽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的“凉州赛神”情景与“酒酒浇白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的“凉州郊外游望”场面，皆系作者于开元二十五年（737）赴任河西节度使幕判官的二年间真实感受，摹写生动，诗中有画。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岑参，更与甘肃结有不解之缘，二人都有大量咏陇诗作，又多系名篇。丝路沿线奇异的山川风物使之笔下生花，而其生花妙笔又为陇原山河增添异彩。高适于天宝十二载（753）秋赴河西陇右节度使幕任掌书记，先后在河西两年有余。凉州城外的百尺烽台（《武威作二首》），昌松东界的鸟道长坂（《入昌松东界山行》），灵云池边的微吟长啸（《陪宴侍御灵云南亭宴诗》），玉门关上的月光笛声（《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还有金城壮丽雄阔的秋日景象（《金城北楼》），一切尽收诗人笔底。岑参曾于天宝八载（749）秋和十三载夏秋间两次赴边出塞，往还均路出陇原，尽情描绘了甘肃境内的形形色色，仿佛一幅陇右风光长卷，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有陇山途中悲壮的别离（《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凉州馆舍欢欣的聚散（《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渭水岸边浓郁的乡思（《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花门楼前飘香的美酒（《戏问花门酒家翁》）。还有尹台寺中的思古幽情（《登凉州尹台寺》），酒泉太守席上的醉歌（《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玉门关将军帐中的狂欢（《玉门关盖将军歌》）。更有皋兰山下、黄河岸边如诗如画的金城胜景：“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忽如江浦上，忆作捕鱼郎。”（《题金城临河驿楼》）时隔千载的今天，我们依然为这首诗中所洋溢着的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深深陶醉。与开元天宝年间渴求立功塞外的王维、高适、岑参的纵情放歌不同，“诗圣”杜甫则于安史乱后的艰难岁月里，“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开始了他秦陇道上的苦旅悲吟。乾元二年（759）秋，诗人辞弃华州司功参军携眷西行，流寓秦州（今天水），写

下了著名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歌咏秦州山川风物，抒写伤时感乱之情，举凡鼓角、天马、驿亭、洮器官、南郭寺、东柯谷、仇池穴，无所不咏。寓居秦州的近四月间，还写有《赤谷西崦人家》、《太平寺泉眼》、《寓目》、《山寺》等吟咏秦州名胜古迹、民俗风习之作。其中《山寺》一首，为古代诗人最早歌咏麦积山石窟的诗篇，真切地描写了唐时麦积山石窟的荒凉景象，表现了陇地奇特的鸟兽花木和丰富的物产以及麦积山石窟奇绝险峻的建筑风格。诗云：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十月，诗人为生计所迫，又踏上了远赴同谷（今成县）的艰险路程，写有《发秦州》等纪行诗十二首，沿途所历奇境险象，一一络绎笔端。同谷一月，饥寒交迫，万苦千辛，诗人唯有长歌当哭，凝成《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的千古名篇。十二月一日，又从同谷出发踏上漫漫蜀道。甘肃境内写有《发同谷县》等四首纪行诗，脚下坎坷，笔底波澜，陇南山水的奇险壮阔，如在目前。杜甫旅居陇右期间，写有近一百二十首诗作，其中直接吟咏陇右山川形胜、风土人情者亦不少于五十首。这的确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后人的珍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诗人虽不能亲至陇上，但对于神奇壮丽的陇右山川和博大精深的雍凉文化，依然是魂萦梦绕，心向往之，他们同样生动地描绘了丝路风光与塞上风云，李白、白居易、元稹、张籍、皮日休便是典型代表。“边城暮雨雁低飞，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磧，应驮白练到安西。”（《凉州词》）这是张籍笔下的丝路重镇凉州古道上商旅不绝的繁盛景象，读来同样真切生动，如在画中。

总之，整个唐代，无论是本土作家的创作，还是旅陇作家的吟唱，抑或省外作家的泛咏，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此外，敦煌石室遗书中的无名氏作品，亦不乏反映甘肃生活的篇什，五律组诗《敦煌廿咏》

和《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望江南·敦煌郡》等曲子词，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宋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萧条和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东移，加之连年战争，河陇地区殷实富庶的繁盛景象和欧亚孔道的战略地位已不复存在，因此整个宋夏金元时期甘肃文学的发展日趋衰落，作家作品寥寥无几。宋代值得一提的甘肃文学作品主要是曲端的一首七言绝句：“破碎山河不足论，几时重到渭南村。一声长啸东风里，多少人归来断魂。”较好地体现了宋金对抗时期人们普遍的爱国情绪，壮怀激越，声情悲切。金代，邓千江却为我们留下了一首被推为“金人乐府第一”（杨慎《词品》）的千古绝唱《望海潮》：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鍪夕解，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

这首词展现了金与西夏军事对峙的壮阔历史背景之下的名城皋兰险峻的形势和激战场景，讴歌了立功疆场的边将和为国捐躯的“英灵毅魄”，境界苍凉辽远，格调沉雄悲壮，正如元人陶宗仪所评，“可与苏子瞻《百字令》、辛幼安《摸鱼儿》相颉颃。”（《南村辍耕录》）元代河西地区的郝天挺、余阙、昂吉、燕不花等人，都有诗作流传，为黯淡的甘肃文坛增添了些许亮色，其中以余阙的创作最为可观，有诗文集《青阳集》行世，其诗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大都清新可诵。

整个宋夏金元时期，外籍旅陇作家较少。虽然苏舜钦、苏轼、黄庭坚、张耒、万俟咏、王十朋、陆游、安如山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陇上名胜、物产以及激荡于陇右大地上的金戈铁马之声与企盼和平之情，但多系泛写遥咏，未能像唐人那样亲历陇上，这以陆游的几首描写凉州的浪漫之作最为典型。因此该时期的咏陇之作一般数量不多，感受不深，水平不高，价值不大。这种现象与甘肃本土创作的

情况是一致的，它与当时甘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有着直接关系。

明清两代，是甘肃文学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陇籍本土作家人数众多，作品丰富，并涌现出了李梦阳、胡纘宗、金銓、张晋、吴镇、邢澍、张澍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家；客籍旅陇作家亦复不少，解缙、李攀龙、吕大器、宋琬、许孙荃、汪灏、洪亮吉等人，或谪居，或游历，或任职，或道经，都有比较真切的陇上生活感受，写出了不少咏陇名作。

如果说，唐代李益堪称甘肃文学史上创作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那么明代的李梦阳则是唯一一位居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的著名陇籍文学家，他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在明代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梦阳为人刚直，痛斥奸佞，五入囹圄而本色不改，颇具政治才干和报国壮志。作为“前七子”的领袖，他与何景明一起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以扭转明初以来“台阁体”萎靡空泛的文风，开创诗文创作的新局面。虽然其文学理论有复古的弊端，但他崇尚汉唐文学传统，倡导阅读古书，增长学识，开阔视野，实有开创新风和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李梦阳诗文俱工，均不乏名篇佳构，尤以诗歌成就突出。胡应麟盛赞其“歌行纵横开阖，神于青莲，七律雄深豪丽，深于杜陵”（《诗薮》），虽不无偏爱，但确也概括了李梦阳诗歌的特色，其后陈子龙、王士禛、沈德潜、谭献等均给予极高的评价。其歌行如《玄明宫行》、《石将军战场歌》、《林良画两角鹰歌》，七律如《秋望》、《秋怀》诸作，均系工力深厚的杰作。和李梦阳同时的胡纘宗，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其七古长篇《可泉歌》描写家乡秦安九龙山一带的秀丽风光，胜景迭出，乡情盎然，堪称佳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激昂悲壮，颇近秦声。无妩媚之态，是其所长；多粗厉之音，是其所短”。同时道出了胡纘宗诗歌的优点与不足，可称的评。早年曾从胡纘宗学习时文的金銓，则以散曲著称于世，在甘肃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萧爽斋乐府》存小令一百三十四首，套数二十四套，举凡天灾、世风、闺情、胜景，皆能

以通俗的语言、灵活的形式表现出来。风格以清丽为主，兼善诙谐，“嘲调小曲妙极，每诵一篇，令人绝倒。”（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落梅风〕《咏蝇》、《咏虱》、《咏蚊》、《咏蚤》四首小令，便是这样的讽世名篇：

从交夏，攘到秋，缠定了不离左右。饶你满身都是口，尝得出那
些儿香臭？

憎头锐，怜性拙，一塔儿热窝中依藉。又不曾苦贪人些多气血，
汤抹着子孙族灭。

明明的去，暗暗的来，怎当他毒如蜂蛰。死来头上还不睬，天生
的嘴尖舌快。

才离了睡，又蚤上身，缠杀人怎生安顿。些娘个儿偏走滚，任遮
拦遣他不尽。

这组小令构思奇巧，幽默辛辣，形象鲜明，语浅意深，为社会上那些损人利己、狡猾奸诈的小人画出了几幅十分逼真传神的肖像。在整个明代曲坛上，他也是一位自具风格、卓有成就的代表作家。

清代的甘肃文学，在明代基础上继续保持发展的态势，一时作家辈出，时有名家。顺治年间的青年诗人张晋，虽届而立之年即死于非命，却首先揭开了清代甘肃文学的序幕，并以“纵横凌厉，出入《风》《骚》”（徐世昌《晚晴簃诗话》）的鲜明个性昭示着甘肃诗坛的未来。乾隆年间，胡铨、吴镇并出，成绩斐然。胡铨多咏家乡山川风物，已属可喜，吴镇则以鲜明的创作特色而使一代才人袁枚心折。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道吴镇诗作“深奥奇博，妙万物而为言。于唐宋诸家，不名一体，可谓集大成矣。”的确，吴镇笔下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大都富情趣，有性灵，清丽自然。尤其是赞美家乡临洮山水民情与金城风物之作，乡情扑而，美感悠长，确有“新妙奇警，夺人目光”（《随园诗话》）之艺术效应。代表作《我忆临洮好》十首，洗尽铅华，一任自然，于平淡中见深情，读来引人入胜，美不胜收。吴镇又能词，况周颐《蕙风词话》采录并评论吴镇词“铿丽沉至，是

能融五代入南宋者”。嘉道时期，陇上“二澍”名闻遐迩，他们不仅是清代具有全国影响的杰出学者，也是卓有成就的诗文大家。邢澍虽以金石考据之学饮誉学林，但其诗却全无有些人“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恶习，抒怀写景，自有情韵。张澍更是朴学华辞，兼长并茂。《养素堂诗集》收诗三千零五十一首，内容宏富，情思浪漫，风格豪壮，笔势奔放。其中反映民生疾苦和描写各地风土人情与关陇山川形胜之作，尤具特色。张澍的散文也为世所重，出经入史，议论纵横，甚见工力。他如张翊、李蕴芳、郭楷、张美如、潘挹奎等人，皆各有所成，其中潘挹奎的散文，叙事写人，气韵生动流畅。值得一提的是，清初的张掖还出现了两位闺阁诗人陈秀全、陈秀勤姐妹，她们传世的作品虽然不多，却能遥应东汉时期的陇西女作家徐淑，可谓难得。

明初，江南才子解缙因上疏批评朝政而被罢官远谪河州（今临夏），留下了歌咏河陇风物人情的篇章，虽数量不多，但写景如绘，其中的《冰灵寺》，还是描写炳灵寺石窟的最早诗篇。此后，谪戍甘肃的车伦、郭登、岳正，为官一方的杨一清、朱真淤、唐龙、陈槩、冯维讷、吕大器，漫游塞上的李攀龙、陈皋谟，等等，都写下了各具风采的咏陇篇章。清代咏陇作品，一如明代。李渔、宋琬、洪亮吉等名家都曾亲至陇上。清初，戏曲大家李渔漫游河陇，有诗描写甘凉道中风物见闻。号称“南施北宋”的宋琬为官秦州，以大手笔写陇南山水，不同凡响。中叶，汪沆历官河西，“有《游千佛洞》诗，极叹其佛像壁画之庄严瑰丽，恐怕是中原人士到千佛洞赏鉴这伟大佛教艺术的第一人”（贺昌群《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诗文大家洪亮吉谪戍伊犁赦还途中道经河西，高吟《凉州城南与天山别放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作品一般描写广泛，感受真切，工力深厚，格律严整，但每每于辽远壮阔的境界之中隐含着一种苍凉悲苦之音，这正是明清之代所以不同于盛唐之世之所在。其中，既有当时甘肃现实的折射，也有文人心态的回声。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序幕。内忧外患，国难当头，文学发生了一系列新变而体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

时代特征。近代时期的甘肃文学，同样也呈现出新的面貌，成为甘肃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五四”以来，无论是本土作家还是客籍作家，依然有一些人沿用古典诗词曲的形式进行创作吟咏，其中亦不乏成功之作。

近代时期的甘肃文学，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仅《陇右近代诗钞》一书，即辑有马疏、牛树梅、张和、马世焘、陈炳奎、吴可读、朱克敬、王权、王源瀚、任其昌、刘开第、孙海、巨国桂、李景豫、安维峻、李于锴、刘尔炘、周应沔、王树中、程天锡、任承允、杨巨川、李克明、范振绪、慕寿祺、田骏丰、王烜、张建、祁荫杰、邓隆、周希武、王永清、韩瑞麟、冯国瑞、李恭、程步瀛、叶惟熙等三十七人的代表作近两千首。其中陈炳奎、王权、任其昌、刘尔炘、祁荫杰等人皆能高视一方，允为翘楚。陈炳奎诗，长于描写淳朴的农村生活和恬静的田园风光，其《田园杂兴八首》六言诗，辞朴景真。又以竹枝词形式反映凉州、金城的民情风俗，新鲜生动。王权“著作宏富，近代陇右人无过之者。”（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其诗举凡列强入侵、官吏盘剥、生灵涂炭与陇上风物、男女情爱、师友聚散，无所不及。《愤诗》四首谴责英法联军的强盗行径和清朝政府的丧权辱国罪行，曾被阿英辑入《鸦片战争文学集》，有“诗史”之誉。“陇南文宗”任其昌，潜心家乡教育事业近三十年，“诗有格律，思力沉厚”（《晚晴簃诗话》），读其描写家乡名胜之作，“陇坂山水，可见厓略”（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刘尔炘诗，则以理趣见长，立意新颖，造语奇警，妙趣横生。晚清遗老祁荫杰之作，其抱残守缺固不可取，但写景状物，历历如绘，加之语言绮丽贍华，风格哀感顽艳，确有独到之处，被于右任誉为“百年博大缠绵句”（《题陇西祁少潭〈滴云诗存〉二首》）。

上述诗人，多兼长文章。朱克敬、王权、任其昌、安维峻、李于锴等人，尤以文名重一时。洋务运动时期，朱克敬流寓湖南三十余年，与郭嵩焘最为相契，勇于著书立说，抒发洋务见解，生前即刊行有《挹秀山房丛书》凡十三种，在湖南思想界、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工

诗善文，尤擅笔记小品，《曝庵杂识》、《曝庵二识》、《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均系代表作。王权也是名闻关陇的古文大家，“类皆有关地方人物地志及世道人心之作，盘屈磊砢，不独胎息韩柳，骎骎乎两汉魏晋之间。”（陈声聪《笠云山房诗文集序》）任其昌的散文以《游麦积山记》和《游石门记》最具特色，描绘家乡风光，明丽如画，诚为甘肃近代散文中的写景名篇。“陇上铁汉”安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清史稿·安维峻传》）他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屡劾权奸李鸿章，指斥慈禧“遇事牵制”。御史任期一年零二月内所撰六十五篇奏疏，义正辞严，名重一时。特别是名篇《请诛李鸿章疏》更是辞激情切，正气浩然，当时即传诵一时，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奋不已。此文与李于锴的《甘肃举人呈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同为甘肃近代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后者写于“公车上书”运动期间，李于锴会同甘肃在京会试举人六十一人，先署名康有为具草的请愿书，又联合甘肃举人七十六人，领衔起草了这份请愿呈文，它以强烈的反帝精神和深挚的爱国情思为世所重。李于锴的人物传记尤具价值，清末古文大家王树楠曾选其传记数篇刊入《故旧文存》，盛赞于锴“其文品盖在同里张介侯之上，西方学者莫能或之逮也”（《味檠斋遗稿序》）。

近代以来的旅陇作家人数更多，林则徐、施补华、王树楠、宋伯鲁、裴景福、俞明震、谭嗣同、许承尧、于右任、高一涵、续范亭、罗家伦，不胜枚举。其中林则徐、王树楠、俞明震、谭嗣同、许承尧、于右任等人，皆为清末民初诗坛名家，这些大手笔的陇上行吟，足以成为历代咏陇篇章之后劲。林则徐谪戍伊犁途中，行经兰州、武威、嘉峪关、玉门等地，均有诗作。这位民族英雄身在边塞，心系海疆，西北关山的雄奇景象与忧国伤时的悲壮情怀凝结成一首首苍凉雄阔的格律严整之作，不仅成为林则徐诗歌的精华所在，也是历代边塞诗中的上乘之作。古文大家王树楠游宦甘肃期间，于南郭寺、朱圉山、崆峒山、六盘山、乌梢岭、嘉峪关诸关山名胜，多所题咏。俞明震出任甘肃提学使期间的作品，独以五言出之，如《月夜登兰州城楼望黄

河隔岸诸山》、《渡黄河西岸行万山中》、《宿凉州》、《大雪登乌稍岭》诸作，雄浑之境出之以清新之笔，堪称描写甘陇奇景之佳作。钱仲联谓其“中年度陇之后，得江山之助，为诗盘郁苍凉，乃具杜味”（《近代诗钞》），正是就这些诗篇而言。青年时代的谭嗣同曾随其任甘肃布政使的父亲谭继洵久居兰州、漫游陇上，写下了许多赞美陇原胜景的杰作。许承尧于辛亥革命后曾任甘肃省长府秘书长、渭川道尹，描写兰州山川形胜之作，如《拂云楼》、《北山寺》、《金山寺》、《水楼洞》、《偕林子豫游金城关》等，皆以五言古体写成，格调高古，境界壮阔，奇景异趣，纷呈笔底。南社诗人于右任一九二二年转战陇南途中和一九四一年巡察河西期间，曾分别以诗、词、曲多种形式吟咏陇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北人气派，战士情怀，不独深得边塞之趣，还别有一层文化意义，如《敦煌纪事诗八首》、《万佛峡纪行诗四首》即是。在如此丰富的咏陇篇什中，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其一）和谭嗣同的《崆峒》是最为人传诵的两首杰作：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崆峒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松擎霄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

一写天下雄关地界东西、拔起秦陇、远望祁连、遥通瀚海的巍峨雄姿，“风格高壮，音调凄清”（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一写崆峒山色奇、险、壮、美的万千气象，“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谭嗣同《报刘淞芙书》）。另外，辛亥革命后，高一涵出使甘青宁监察使驻兰州期间，写成《金城集》刊行，存诗六百余首，绝大多数为咏陇之作。罗家伦考察西北时著《西北行吟》，收绝句二百首，咏陇之作亦复不少。如此以专集咏陇，这在历代作家中还不多见。

从古到今，陇原大地从来都是民歌的沃土，从周代的《秦风》，到